学术专论

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原因、过程与特征

濮思喆

[摘要] 储蓄银行是一种专门收存民众零星存款的特殊银行类型，起源于英国并向全球传播，清末经日本传入中国。储蓄银行因其便利民众存款、促进实业发展、弥补财政缺款等优势迅速在清末各地兴起。清末储蓄银行倡办者主要有中央机构、各地督抚、各地绅商三类。储蓄银行的兴起具有营利组织、及时立法、兼营模式、结合传统四个特征。新政期间新的时代氛围、经济机构、经济法规、官商关系等现代因素，也为储蓄银行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末储蓄银行兴起所体现的"全球本土化"实践逻辑，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的金融近代化。

[关键词] 储蓄银行　金融近代化　全球本土化　清末新政　储蓄存款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5–0145–015

目前学界对于晚清银行史的叙述一般始于1845年英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在华设立分支机构。随后，各国相继来华设立银行分支机构或新设银行，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渐为外国资本所控制。1897年，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中国近代银行业由此发轫。无论是华资银行或外商银行，晚清银行史叙述的主线始终是商业银行的兴起与发展。当然，户部银行、大清银行等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机构也受到一定关注，① 相对受到忽视的是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储蓄银行是一种专门收存民众零星存款的特殊银行类型，起源于英国，随后逐渐向全球传播。储蓄银行于清末经日本引入中国，并在当时掀起一股创办储蓄银行的热潮。

目前关于近代储蓄银行存在两种研究取向。其一是将其视作一种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特殊银行类型。这一研究取向起始于民国时期的周葆銮、王志莘。近来英文学界在这一研究取向上也出现一些论著。② 这一研究取向将近代储蓄银行的产生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把握，并指明了中国近代储蓄银行的营利组织、兼营模式两项特征。其二是将储蓄视作一般商业银行的一项业务。在

[**收稿日期**] 2024–03–11

[**作者简介**] 濮思喆（1991—　），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nklspsz@163.com

① 孔祥贤：《大清银行行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郑成林、钟钦武：《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史学月刊》2022年第3期等。

② 民国时期研究参见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4编，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32页；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初版刊于1934年）等。英文研究参见 Brett Sheehan, "The Modernity of Savings,1900–1937", Madeleine Yue Dong, et al.,eds.*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p. 121–155; Weiping Tsai, *Reading Shenbao: Nationalism, Consumerism and Individuality in China 1919–37*,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45–70；等等。

这一研究取向之下，清末的储蓄银行（如信成、四明等银行）被视作私营商业银行的代表。[①] 储蓄业务则因其收集小额存款的创新意义，而得到高度评价。[②] 第二种研究取向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中国近代储蓄银行为营利组织，并主要采用了兼营模式。这些特征均有异于西方或日本。为什么中国近代储蓄银行会呈现出不同其他国家的特征呢？上述研究均未解答，而之所以难以解答，是因为上述研究均缺乏对于储蓄银行全球传播路径、各国储蓄银行特征的分析。对于清末储蓄银行兴起，上述研究也仅仅将其视作民国时期储蓄银行大发展的序曲而一笔带过。但清末恰恰是近代中国储蓄银行特征形成的关键时段。[③]

因此，若要厘清近代中国储蓄银行发展的脉络，我们应当利用中外文史料，考察储蓄银行自英国起源至引入清末中国的传播路径，再详细阐明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原因、过程、特征，并通过中国与日本、西方的比较，揭示经济、金融环境的差异，从而解释近代中国储蓄银行特征的由来。清末储蓄银行兴起与商业银行有着不同的实践逻辑，也难以为“革命史”或“现代化”范式所涵盖。本文研究对象为清末经营储蓄业务的银行，兼及邮政储蓄银行的筹设。

一、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原因

（一）外因

在 19 世纪之前，西欧银行业以政府、企业或大地主、商人为主要客户。普通民众的资金总额往往很少，而取用又很频繁。这对于当时的银行来说，意味着巨大的人工成本。普通民众作为储户，数量较多，易受流言影响，很容易发生挤兑，有较大的流动性风险。而普通民众的储蓄往往是其全部家资，银行一旦倒闭，则会引发社会动荡，其中又有较高的社会风险。因此，由于风险和成本的限制，在储蓄银行出现之前，西欧的银行业并不接收民众的小额存款。

一般认为，近代储蓄银行起源于英国。储蓄银行的产生主要源于工业革命后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当时一些倡导者认为通过提倡节俭储蓄可以宣扬自助、自立的精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问题。阻碍民众储蓄的主要因素为普通银行的起存点过高，民众的微薄积蓄达不到存款要求。因此，乡村牧师亨利·邓肯（Henry Duncan）于 1810 年在苏格兰创建了第一家储蓄银行——鲁斯维尔教区银行（Ruthwell Parish Bank）。[④] 该银行存款起点从普通银行的 10 英镑降至 1 先令，另设定 10 英镑的最高额。该银行主要为中下层民众服务，利率略高于普通银行，为防止富裕人群存入大量资金套利，还设置了存款的最高限额。[⑤] 英国的储蓄银行为慈善组织，不以营利作为目的。鲁斯维尔教区银行的组织架构主要来源于英国当时盛行的慈善组织——友谊会（Friendly Societies）。

至 1860 年，英国有储蓄银行 638 家，账户约 158 万户，总储蓄额达 4143 余万镑。[⑥] 英国储蓄银行体系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之后英国完善的公共信用体系。1817 年，乔治·罗斯法案（George Rose’s Act）的顺利通过，是国家介入储蓄事务的开始。该法案确立了政府投资原则，即各储蓄银行资金汇集后，统一在英格兰银行开立账户，成立储蓄银行基金，由国家债务专员负责管理。国家债务专员用储蓄银行基金购买国债，并在国债的

---

① 程麟荪：《近代中国的银行业》，徐昂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35–36 页。

② 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年，第 142–143 页。

③ 贾秀堂、李学昌：《近代中国邮政金融事业的创办与社会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16 年第 1 期；李楠夫：《两个地方性金融机构所起的“超地方”影响——周学熙在清末创办北洋银元局和天津官银号述论》，《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 年第 4 期；等等。

④ H. Oliver Horne, *A History of Savings Banks*, Oxford & IBH Publishing Co., 1947, p.43.

⑤ Henry Duncan,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Advantages of Parish Banks*, 1815.

⑥ H. Oliver Horne, *A History of Savings Banks*, p.388.

收益之外提供额外的利息补贴。为了更好地推行节俭并获取财政资金，完全由英国政府担保并运营的储蓄机构——邮政储蓄银行于 1861 年成立。因此，英国的储蓄银行以购买国债作为主要投资方向，有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重要作用。部分储蓄银行在 19 世纪 70 年代率先推出特别投资部门，可以投资地方债、公司债与抵押贷款等。特别投资部门的设立，使得英国的储蓄银行又有直接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作用。① 因此，19 世纪初流行的个人主义是储蓄银行的思想源头，友谊会为储蓄银行的产生确立了组织基础，英国率先兴起的民族国家建设，则为储蓄银行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投资渠道。

1818 年，法国首家储蓄银行在借鉴英国的基础上建立。② 至 1847 年，法国已有 364 家储蓄银行。③ 至 1900 年，德国也有约 2685 家储蓄银行。④ 德、法的储蓄银行也均为慈善组织。美国在 1816 年成立首家储蓄银行，至 1900 年，储蓄银行的数量增加到 1002 家，总存款达到约 24 亿美元。⑤

储蓄银行传播至美国后出现“分流”，开始广泛出现营利性储蓄银行。日本商人原六郎在 1880 年模仿美国芝加哥的营利性储蓄银行，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储蓄银行——东京贮藏银行。⑥ 日本储蓄银行发展迅速，至 1910 年，日本有储蓄银行 646 家，总存款达 1.47 亿日元。⑦

储蓄银行因其便利平民存款、弥补财政资金不足、促进工商业发展等优势，于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在机构数量、存款总额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1906 年，无锡绅商周廷弼在东渡日本考察后，仿照日本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储蓄银行——信成银行。因此，储蓄银行传播至中国的路径为英国→美国→日本→中国。作为外因的储蓄银行全球传播与清末储蓄银行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余论部分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二）内因

与 19 世纪之前的欧美各国类似，我国传统金融机构由于风险和成本的限制，也一般不接受民众的小额存款。清末的典当、钱庄、票号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本土金融机构类型。传统金融机构存款资料比较零散难觅，以刘秋根所摘录清代典当私人存款史料为例，最少也有七十余两，多者达数万两。⑧ 上海钱业公会主办的《钱业月报》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曾刊载两篇文章，倡导钱庄兼营储蓄银行业务。⑨ 类似地，江苏宝山县的典当业也曾在 1913 年筹设储蓄处。⑩ 由上述材料可以反证，在储蓄银行出现前，典当、钱庄并未开设类似储蓄的小额存款业务。⑪ 清末，有论者批评传统金融机构不接受民众小额存款，“不知银局钱铺只知术工垄断，不思利济小民。故于丰富之家多数之款，则欢迎之；贫窭之家零碎之款，则谢绝之”。⑫

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各大商埠率先开始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及至清末，以货币工资作为收入来源的城市工人、雇员已相当普遍。但他们的积蓄达不到钱庄、商业银行等

---

① H. Oliver Horne, *A History of Savings Banks*, pp.71−295.

② H. Oliver Horne, *A History of Savings Bank*, pp.89−90.

③ Jürgen Mura ed., *History of European Savings Banks*, trans. Margaret Jelbert, Deutscher Sparkassenverlag, 1996, p.78.

④ Jürgen Mura, ed., *History of European Savings Bank*, p.107.

⑤ WM. H. Kniffin, Jr., *The Savings Bank and Its Practical Work*, The Bankers Publishing Company, 1912, pp.86−87.

⑥ 板沢武雄、米林富男共編:《原六郎翁伝》上卷，原邦造，1937 年，第 360 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info:ndljp/pid/1257319。

⑦ 協和銀行行史編集室編:《本邦貯蓄銀行史》，協和銀行，1969 年，第 42、119 頁。

⑧ 刘秋根编:《中国典当史资料集 (前 475—1911)》，河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93−100 页。

⑨ 久道:《钱业宜于兼营储蓄》，《钱业月报》第 4 卷第 3 期，1924 年；谦益:《内地钱庄可试办储蓄业务》，《钱业月报》第 10 卷第 5 期，1930 年。

⑩ 《宝山各典附设储蓄处简章》，《宝山共和杂志》1913 年第 10 期。

⑪ 票号以经营政府和商号的大额汇兑为主业，其接受小额存款的可能性更小，在此不再作详细讨论。

⑫ 《银行专修科附生王梦龄等禀请广设储蓄银行文并批》，《北洋官报》第 2284 期，1909 年。

所设定的最低存款标准。而城市密集的居住方式有异于农村，普通民众的微薄积蓄面临盗窃、损毁等多重风险，“储蓄银行非特储款而已，又包含保险之事，夫手中有现资，则盗窃、水火，在在堪虞”。[①] 郑观应于1894年在《盛世危言》中较早介绍了储蓄银行有便利平民存款的优势，并指出了西方储蓄银行的慈善性质，“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有贫民银行，系官绅商贾乐善为怀，特设为贫民存款，代为支放，月给利息起见，或设于各商埠，或设于各村乡”。[②] 周廷弼在申请开办信成银行的呈文中指出：“现在沪埠各厂工人以及推车扛货食力之夫，不下数十万人。日获之资，所积虽微，存储无地，不免易于耗散，职道悯之。”[③] 储蓄银行多以复利计息，可以给予民众一定利息回报，“既存储矣，皆得计算以复利，本能生利，利复生本，本利相加，源源不绝。”[④] 民众若能节俭储蓄，也可为未来生活提供一定保障，“银行为之收存，为之谋将来利益，令养生送死而无憾，备饥荒疾病之不虞”。[⑤] 因此，储蓄银行的兴起因应民众迫切的存款需求，既具有存本付息的经济意义，又具有保障民众未来生活的社会意义。

而清末民众最主要的货币储蓄方式仍以窖藏为主，即将货币秘藏于住宅或其他固定地点。窖藏使得货币脱离流通领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能。资本匮乏是中国近代企业初创期的普遍现象。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清末对于储蓄银行的介绍更注重阐明储蓄银行可以集合零星存款为大额资本进行投资，从而促进国内工商业发展，“（储蓄）银行吸集最易消耗之零星银钱，成一巨额之母财，复贷出之于农、工、路、矿营业家，以产殖国财。”[⑥]

庚子事变后，清廷开始举行新政，而财政经费的困窘是制约新政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长远而言，国家财政的充裕在于民间财富的扩大，而储蓄银行的发展有利于民间财富的积聚与增长，“夫储蓄银行之有功于食苦者流，固不烦罕譬而喻。即由增长国家富力一事言之，亦确非其他之经济政策所得比拟者。”[⑦] 从短期而言，如若国内公债市场有所发展，中国的储蓄银行也可如国外储蓄银行一样购买公债，将储蓄存款转化为财政资金。1907年初，广东候补知府吴荫培赴日考察后，由两江总督端方代奏，提出五条紧要建议，其中有：“一、各省试办储蓄银行及邮便局存款事也……日本有储蓄银行，日币自十圆起，计日生息。又有存款于邮便局者，以日币一分购印花一枚，积印花十枚为日币一角，亦可附存，取息满五圆作公债券，政府为便益小民，力任保护之责，随时收放，遍国通行。是以百姓之财莫非国家之财，挹彼注兹，不穷应付。”[⑧] 吴荫培在此件奏折中充分指明了储蓄银行对于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重要作用。

除钱庄、典当、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外，清末在储蓄银行出现以前，近代银行业也取得一定发展。据统计，成立于1906年前的银行共有六家，有中外合办银行一家、商业银行四家以及带有中央银行性质的户部银行。[⑨] 因此，在储蓄银行出现之前中国近代银行业已有一定基础，但上述银行均非储蓄银行。

总体而言，储蓄银行对于民众具有存本付息、提供保障的经济与社会意义，对于工商业发展具有吸收零款、集聚资本的促进作用，对于国家具有培植富力、弥补缺款的财政意义。正因为上述优势，储蓄银行在清末被引入中国后，迅速为朝野上下所提倡。而清末近代银行业的初

① 《论中国亟宜推广储蓄以厚母财》，《东方杂志》第3卷第9期，1906年。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该书初版刊于1894年。
③ 《创设储蓄银行禀批汇录》，《津报》1905年10月16日，第6版。
④ 《银行专修科附生王梦龄等禀请广设储蓄银行文并批》，《北洋官报》第2284期，1909年。
⑤ 《论中国亟宜推广储蓄以厚母财》，《东方杂志》第3卷第9期，1906年。
⑥ 《论中国亟宜推广储蓄以厚母财》，《东方杂志》第3卷第9期，1906年。
⑦ 《论储蓄银行之亟宜筹设》，《盛京时报》1910年11月30日，第2版。
⑧ 吴荫培：《吴荫培日记》，潘振方整理，凤凰出版社，2023年，第349页。
⑨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501–502页；兰日旭：《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的变迁及其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步发展，则为储蓄银行的引入确立了实践基础。

二、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过程

在信成银行成立以前，汇丰银行已于1881年在上海开办储蓄业务，并刊登了最早的储蓄广告。[①] 周廷弼早年经营铁业致富，曾创办裕昌丝厂，因提倡实业有功，被商部聘为三等顾问官。[②] 信成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③] 该行总行设于上海南市，于1906年9月正式营业。[④] 总理为周廷弼，协理为沈缦云。从该行存款章程，可了解其业务经营情况："第一条，本银行分设二柜，一系商业银行之柜，一系储蓄银行之柜。凡汇划兑换以及百元以上趸款存付，俱归商业银行柜台办理。凡自一元以上之零星存户，俱归储蓄银行柜台办理。"[⑤]

1907年3月，农工商部将前述吴荫培奏折涉及农商事宜部分札饬各省商会。[⑥] 随后，天津银号禀请袁世凯兼办储蓄银行，便引述农工商部的饬文："农工商部咨开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准内阁抄交两江总督代奏知府吴荫培出洋游历回国条陈考察事宜一折内，有试办储蓄银行一则。"[⑦]1907年，四川广元官绅议办储蓄银行，禀请四川总督赵尔丰，"季帅（即赵尔丰）以日本储蓄银行其法甚善，凡存银自十元起，计日取息"。赵尔丰上述表述类似于吴荫培奏折中词句，可知四川已接到农工商部饬文。[⑧] 山东巡抚杨士骧在接到农工商部饬文后，"昨已饬知农工商局转饬通省各州县，拟章试办汇详核咨矣"。[⑨] 因此，农工商部此件饬文，对各地倡办储蓄银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末储蓄银行的兴办不仅与农工商部有关，也与时任该部尚书的载振个人有关。1902—1903年，载振曾两次出国考察，对于吴荫培奏折所述日本储蓄银行自然并不陌生。[⑩] 周廷弼被农工商部聘为顾问官，也因此与载振有个人往来。可以说明二人往来关系的一个证据是，信成银行所发钞票中印有载振肖像。[⑪] 因此，信成银行在北京开设分行时，周廷弼晋谒载振，并得到载振的"大加奖许"。载振同时应允，由商部拨银50万两存于信成银行北京分行，以资提倡。[⑫]

1907年6月，度支部在议覆福建拟设官钱局、官纸局折中，明确阐述了该部推广储蓄银行的计划，"至储蓄银行，为便利贫民起见，俟部设之分银行成立后（按，指大清银行分行），各省均须兴办，或由官立，或由民立"。[⑬]1908年，度支部在奏定《储蓄银行则例》后，于该年亦

① 宋佩玉：《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究（1847—1949）》，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第77页。
② 王金中等主编：《无锡工商先驱周舜卿》，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1–26、106–109页。商部成立于1903年，1906年11月改组为农工商部。本文根据对应时间分别称为商部或农工商部。
③《上海信成储蓄银行有限公司招股章程并启》，《东方杂志》第3卷第2期，1906年。
④《本埠新闻》，《时报》1906年9月11日，第3版。
⑤《信成储蓄银行存款章程》，《申报》1906年3月28日，第17–18版。
⑥《札行各省商会举办农商要政》，《津报》1907年3月9日，第3版。
⑦《天津银号详兼办博济储蓄银号拟定宗旨章程折式请立案通饬文并批》，《北洋官报》1364期，1907年。
⑧《开办储蓄银行》，《广益丛报》第154期，1907年。
⑨《（山东）部饬振兴实业》，《津报》1907年4月13日，第6版。
⑩ 1902年4月，载振等为致贺英王登基赴英，并游历英、法、美、日等国，参见载振：《英轺日记》，吴仰湘校点，岳麓书社，2016年。1903年4月，载振等为参加大阪博览会赴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中国参加日本大阪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史料》，《历史档案》2005年第4期。
⑪《信成商业银行营业章程》，《申报》1906年4月14日，第10版。
⑫《商部允拨银五十万补助开办储蓄分行》，《申报》1906年11月5日，第3版。
⑬ 奎濂等校勘：《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辑要》卷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7辑，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661页。

向各省劝办储蓄银行。[①]

正是在高官载振以及农工商部、度支部等中央机构的大力提倡之下，各省官员、绅商才开始兴办储蓄银行。笔者根据清末报刊及其他相关资料，统计 1906—1911 年各地倡办储蓄银行提议如表 1。

表 1　清末储蓄银行倡办提议表

行名	地点	提议时间	参与者 / 机构	是否创办
信成银行	江苏上海	1906	周廷弼等	是
通州储蓄兼商业银行	江苏南通	1906	张謇等	否
商部储蓄银行	北京	1906	（农工）商部	不详
通济商业储蓄银行	北京	1906	刘坦等	不详
福建官银行	福建福州	1907	闽督崇善等	不详
和慎储蓄银行	江苏常州	1907	恽祖祁等	是
不详	四川广元	1907	广元官绅、川督赵尔丰	否
湖北公储钱局	湖北武汉	1907	鄂督张之洞、高松如等	是
信义储蓄银行	江苏镇江	1907	尹克昌、马相伯	是
信利银行	江苏苏州	1907	苏州商务总会	不详
博济储蓄银号	直隶天津	1907	天津银号、直督袁世凯	是
浙江兴业银行	浙江杭州	1907	浙江全省铁路公司	是
不详	河南开封	1907	汴抚林绍年、候补知县程逢春、开封钱业	不详
不详	四川重庆	1907	重庆商会	不详
大连储蓄公司	大连	1907	大连华商	是
不详	湖北武汉	1907	宋炜臣、刘歆生、李一琴等	不详
八旗储蓄银行	北京	1908	度支部、载泽等	否
公益商业储蓄银行	北京	1908	陆军部、顾瑗等	是
磁州储蓄公司	直隶磁州	1908	李麟阁等	不详
四明银行	江苏上海	1908	周晋镳、朱葆三等	是
（硖石）大通银行	浙江海宁	1908	杨鼎恩等	是
北京储蓄银行	北京	1908	度支部	是
不详	江苏江宁	1908	某道员	不详
不详	哈尔滨	1908	山西某富商	不详
学部储蓄银行	北京	1908	学部	不详
协和储蓄银行	安徽芜湖	1908	恽祖祁等	不详
均益储蓄公司	广东	1908	前碣石镇总兵刘永福等	不详

① 《劝办储蓄银行》,《农工商报》第 49 期，1908 年。

（续表）

行名	地点	提议时间	参与者 / 机构	是否创办
广西银行	广西	1908	桂抚张鸣岐	不详
和大商业储蓄银行	江苏扬州	1909	庄泰等	是
（汉口）大信储蓄银行	湖北武汉	1909	尹湘琳等	否
不详	山西太原	1909	晋泰官钱局、晋藩丁宝铨	否
裕商商业兼储蓄银行	江苏上海	1909	盛昌颐等	是
不详	湖北武汉	1909	浙商罗芷卿	不详
宝成贞储蓄银行	四川隆昌	1910	黄民增等	不详
山东储蓄官银号	山东济南	1910	道员王某等	不详
不详	吉林	1910	吉林商会	不详
不详	奉天安东	1910	不详	不详
不详	奉天铁岭	1910	铁岭南三乡议事会	不详
不详	奉天锦州	1910	锦州官、商两界	不详
锦府殖业兼储蓄银行	奉天府	1910	崇配山等	不详
邮政储蓄银行	北京	1910	邮传部、盛宣怀等	否
不详	奉天府	1911	奉天南、东两镇董议事会，东督赵尔巽等	不详
桂富银行	广西南宁	1911	张盛桢、蒋实英等	否
环通商业储蓄银行	四川	1911	马德宜等	不详
不详	福建福州	1911	福建商会	不详

说明：广西、福建银行成立于辛亥革命前，暂无明确史料表明二者在清末开办储蓄业务。

资料来源：《集议创办储蓄银行》，《新闻报》1906 年 5 月 27 日，第 3 版；宁波帮博物馆编：《四明银行史料研究》，宁波出版社，2018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92 辑，中华书局，1996 年，第 382−383 页；等等。

当时共有 45 起提议，明确成立的有 13 起，分别为信成银行、和慎储蓄银行等，约占 29%。45 起提议广泛分布在北京、江苏、福建、四川、湖北、直隶、广东等省，但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等大型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这些提议可分为三类，分别为中央机构倡办、地方督抚倡办、各地绅商倡办，下文分别介绍。

由中央机构倡办的分别为商部储蓄银行、八旗储蓄银行、公益商业储蓄银行、北京储蓄银行、学部储蓄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共 6 起提议。明确成立的有公益商业储蓄银行、北京储蓄银行。商部曾议办商部储蓄银行，“复行提议由官商集股五万金……名曰商部储蓄银行”。① 但及至清亡，该行始终未成立。1907 年，直隶布政使增韫为筹划旗丁生计提出办法四条，其中一条为设立劝农银行，待业务发展后，以其为基础设立储蓄银行。② 后度支部未设八旗储蓄银行，而在大清银行内附设旗务储蓄柜。③1908 年，翰林院编修顾瑗等“在京开设商业兼储蓄银行，筹集

① 《重议开办储蓄银行》，《新闻报》1906 年 11 月 16 日，第 3 版。
② 《直隶布政使增韫奏推广旗丁生计办法折》，《政治官报》1907 年第 21 期。
③ 《设立旗务储蓄柜》，《神州日报》1909 年 1 月 3 日，第 3 版。

股本银一百万两，先收五分之一，已集有股本二十万两”，禀请度支等部注册。① 该行 1908 年 10 月在北京开业，陆军部参与筹办。②

1908 年，度支部奏请于大清银行内附设储蓄银行（即北京储蓄银行），并划拨银 10 万两作为股本。③ 据报载，学部有设立储蓄银行计划，“专为收发各学堂之经费以及出洋学生之经费，并可储蓄学生之各项学费等，借以为开源之法云云”。④1907 年 10 月，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拟订分年筹办邮政清单，其中有关于邮政储蓄内容。⑤1911 年，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后，在奏折中再次指出：“并欲试办储蓄为裕国足民之计，欧亚各国邮政与电报、储蓄，本属钩连。”⑥ 盛宣怀的计划可能已进入实施阶段，但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

地方督抚试图以各省原有的官银钱号（局）为基础，倡办储蓄银行，作为其原有存款业务的延伸。官银钱号（局）起源于雍正年间，甲午战后各省多有开设，是一种地方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本土金融组织，承担多种地方财政、金融功能。⑦ 提议省份有福建、湖北、直隶、广西、山西、山东，共 6 起，明确创办的有湖北、直隶二省。1907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储蓄银行，并曾派员前往日本考察储蓄银行。⑧1908 年初，该机构改名湖北公储钱局。⑨ 天津银号为直隶官办银号，于 1907 年筹划设立储蓄银行。天津银号将其定名为博济储蓄银号，禀报直隶总督袁世凯后，获得批准开办。⑩

其余 33 起提议多为地方绅商倡办，现试举两例，简要说明绅商提议的背景、过程及其社会网络。恽氏与盛氏（即盛康、盛宣怀家族）同为常州望族，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恽祖祁曾任湖南零陵知县，经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简授福建兴泉永道。此后，恽祖祁退居乡里，致力于地方经济社会事业。⑪ 他于 1906 年创办武阳（武进、阳湖）商会，当选首任总理，并连任至 1912 年。⑫ 恽祖祁正是凭借其个人与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才得以成功创办储蓄银行。1907 年，恽祖祁禀报农工商部，请求创办和慎储蓄公司，“俟内地风气开通，即当改名银行”。⑬ 得该部批准后，恽祖祁遂邀集常州钱庄、典当二业，拟集股 30 万元开设储蓄银行，并特别指出此举是“免致利权外溢，此关地方大局”，⑭ 体现了鲜明的保护地方利益倾向。1908 年 4 月，和慎储蓄银行正式成立。⑮ “宁波帮”是明清著名商帮之一。上海开埠以后，宁波商人汇集上海，在上海商界颇有影响力。1908 年 4 月，周晋镳、朱葆三、虞洽卿等旅沪宁波绅商，拟集股 150 万两发起成立四明银行，以上海为总行，在宁波开设分行，兼办储蓄银行业务。⑯ 该行于 1908 年 9 月正

---

① 《呈请开设商业兼储蓄银行请予注册保护事》，翰林院编修顾瑗，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21-0564-0007。

② 《开办公益储蓄银行》，《顺天时报》1908 年 10 月 13 日，第 7 版；《陆军部设公益银行》，《神州日报》1908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

③ 《又奏请于大清银行内附设储蓄银行片》，《政治官报》1908 年第 193 期。

④ 《学部拟筹款新法》，《神州日报》1908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

⑤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 19，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3 辑，文海出版社，1975 年，第 495-497 页。

⑥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 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3 辑，第 447-448 页。

⑦ 杨涛编著：《清末官银钱号史料辑注》“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18 页。

⑧ 《官钱局附设储蓄银行》，《新闻报》1907 年 3 月 22 日，第 4 版；《汉口通信》，《顺天时报》1907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

⑨ 《储蓄银行改名公储钱局》，《新闻报》1908 年 1 月 8 日，第 4 版。

⑩ 《天津银号详兼办博济储蓄银号拟定宗旨章程折式请立案通饬文并批》，《北洋官报》第 1364 期，1907 年。

⑪ 恽宝惠：《心耘公家传》，恽宝惠等纂修：《恽氏家乘》前编卷 12，光裕堂，1949 年。

⑫ 《恽心耘追悼会文献》，常州市档案局（馆）编：《民国武进商会档案史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2-14 页。

⑬ 《补录商会总理为创办储蓄公司事禀农工商部文》，《申报》1907 年 8 月 16 日，第 12 版。

⑭ 《定期会议开办储蓄银行》，《申报》1907 年 7 月 31 日，第 12 版。

⑮ 《储蓄银行开市》，《新闻报》1908 年 4 月 22 日，第 11 版。

⑯ 《上海四明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招股启》，《申报》1908 年 4 月 1 日，第 1 版。

式开业。[①] 据统计，该行成立之时，来源于宁波商人的资本至少在 20% 以上。首任职员也多是宁波人。[②]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绅商创办储蓄银行大致有两种模式，其一如恽祖祁等，凭借其个人与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在本地成功筹组储蓄银行；其二如周晋镳等，凭借在重要商埠的同乡网络，汇集股本并招揽人才，在商埠成功创办储蓄银行。

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具有积极影响。据信成银行第二届报告，“本埠二行收入储蓄款项□四十万两、存款六十万两，又天津储蓄三十六万余两、存款十九万两，无锡储蓄七千余两、存款十五万两”。[③] 四明银行也营业颇盛，于 1909 年 2 月迁入新址，当日储蓄柜收入存款 78 004 元。[④] 湖北公储钱局开业后，“一时负贩小民及农夫、村妇争相存贮，半月来，已逾十万”。[⑤]

在新政经费窘迫的财政状况之下，中央机构和各省督抚借储蓄银行之名自建银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费困难。恽祖祁等本地绅商举办储蓄银行的原因在于，意识到类似信成、信义等银行快速在各地扩张，威胁到地方绅商的利益。而如周晋镳等在商埠的外地绅商，可能看重储蓄银行在人口密集的商埠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储蓄银行因其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也为相当一部分民众迅速接受。清末储蓄银行也就此兴起。

储蓄银行在清末新政时期兴起并非偶然，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趋新求变的风气虽不自新政始，但在新政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新政时期趋新求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出国游历之风盛行。周廷弼正是在亲往日本考察储蓄银行实际经营之后，向商部呈请开设信成银行。吴荫培具有日本游历的经历，才写出推动储蓄银行兴起的奏折。趋新求变时代氛围的形成，也使得官员、商人、民众相较以往更乐于接受储蓄银行等新生事物。第二，新政时期设立的商部（农工商部）、商会有助于储蓄银行的兴起。商部自 1903 年设立后，曾颁行一系列奖赏商人的政策。周廷弼正是在这一政策下被赏给商部三等顾问官、二品顶戴。农工商部也通过饬文推动了各地绅商兴办储蓄银行。前文所列清末各地倡办储蓄银行提议中有多例涉及商会，如吉林、福建的倡办提议由当地商会发起。[⑥] 第三，新政时期通过的一系列经济法规表明，主政者已认识到法律法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下文所述《储蓄银行则例》才得以在第一家储蓄银行出现仅两年后，即迅速颁行。第四，清末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一系列举措提高了商人地位，传统官商关系有所转变。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官商之间一度确立了振兴工商的松懈联盟”。[⑦] 农工商部发文倡办储蓄银行后，各地绅商多有响应之举，体现了这一时期官商关系的暂时转变。

三、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特征

（一）营利组织

清末即有论者指出：“吾国现有之储蓄银行则为股东谋利而设，非若西国之纯为慈善事业者也。”[⑧] 清末储蓄银行为营利组织这一特征主要仿自日本，欧美各国近代储蓄银行则主要为非营利

① 《四明银行开市纪盛》,《神州日报》1908 年 9 月 12 日，第 9 版。
② 宁波帮博物馆编:《四明银行史料研究》，第 10–11 页。
③ 《银行股东会议要则》,《神州日报》1908 年 3 月 3 日，第 9 版。
④ 《四明银行发达之一斑》,《申报》1909 年 2 月 17 日，第 19 版。
⑤ 《公储钱局之效果》,《顺天时报》1908 年 3 月 27 日，第 4 版。
⑥ 《商会拟办储蓄银行》,《盛京时报》,1910 年 9 月 22 日，第 5 版;《商会议办储蓄银行》,《闽报》1911 年 5 月 11 日，第 3 版。
⑦ 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14 页。
⑧ 心一:《说储蓄银行》（续前）,《神州日报》1907 年 6 月 19 日，第 10 版。

组织。为何东亚与欧美的储蓄银行组织形态截然不同？下文予以简要分析。

美国的储蓄银行除相互储蓄银行为非营利性质外，也广泛存在营利性质的储蓄银行。日本商人原六郎建立的第一家储蓄银行模仿的是美国芝加哥的储蓄银行。① 而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除一家以外，其余的储蓄银行都以股份公司的形式运营。② 美国的营利性储蓄银行与非营利性储蓄银行的分布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非营利性储蓄银行均集中在东部与新英格兰各州，营利性储蓄银行分布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各州。③ 关于美国储蓄银行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美国两位学者做出了大致相同的分析。凯耶斯（Emerson W. Keyes）认为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和金融基础远不如东部，这一差异导致伊利诺伊州无法产生非营利性储蓄银行。④ 尼芬（W. H. Kniffin）进一步认为，为储蓄银行提供无偿服务的慈善精神，是经济高度发展之后的产物。⑤ 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造成美国内部储蓄银行组织差异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比较适合发展非营利性储蓄银行，反之则适合发展营利性储蓄银行。

储蓄银行传入日本与中国之时，两国均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一差异类似于美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笔者推测，日本商人原六郎可能发现了这一相似之处，并认为营利组织形态更适合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从而自美国引入了营利性储蓄银行。营利性储蓄银行也通过日本传入中国，使得中国近代的储蓄银行也为营利性质。

但在现代经济、金融取得一定发展之后，中、日两国相继出现非营利性储蓄机构。如中国在 1919 年成立的俭德储蓄会，即为非营利性质。⑥1922 年，日本出现了类似美国的相互储蓄银行——第一相互贮蓄银行，也为非营利性质。⑦ 这从另一个层面反证了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储蓄银行组织形态的主要因素。

（二）及时立法

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及时立法，为初兴的储蓄银行提供法律依据与经营指导。1908 年，度支部奏定颁行的《储蓄银行则例》主要源自日本于 1895 年修订后的《贮蓄银行条例》，共十三条。⑧ 随《储蓄银行则例》一同颁布的还有《银行通行则例》《大清银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银行通行则例》与《储蓄银行则例》之间的关系为一般法规与特殊法规。现有研究对《储蓄银行则例》与司法实践关系的探讨有明显不足。⑨

信义储蓄银行是近代第一批倒闭的储蓄银行之一。该案形成的判例对于其后的司法实践影响深远。信义储蓄银行成立于 1907 年，创办人为尹克昌、马相伯，总行在镇江，兼办商业、储蓄银行业务，并发行钞票。1909 年，有人散发传单称该行资金周转不灵，从而引发挤兑并宣告停业。其清偿顺序首为先兑付信义储蓄银行所发钞票，次为储蓄存款，最后为普通存款及其他债务。现有研究已大致指出这一次序，但对其原因未作深入探讨。⑩ 钞票因其广泛的流通性，自然应当给予优先兑付。为何储蓄存款偿付次序优于普通存款及其他债务呢？笔者认为可以从法

① 板沢武雄、米林富男共編：《原六郎翁伝》上卷，第 360 頁。

② Emerson W. Keyes, *A History of Savings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Bradford Rhodes, 1878, p.416.

③ W. H. Kniffin., *The Savings Bank and Its Practical Work*, pp.77−83.

④ Emerson W. Keyes, *A History of Savings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p.430.

⑤ W. H. Kniffin., *The Savings Bank and Its Practical Work*, pp.77−83.

⑥ 李彬彬：《俭德储蓄会及其在近代上海公共文化领域的影响》，《安徽史学》2020 年第 6 期。

⑦ 協和銀行行史編集室編：《本邦貯蓄銀行史》，第 166−170 頁。

⑧ 《储蓄银行则例》等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 4 卷，洪佳期等点校，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20−132 页。

⑨ 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上、下册；刘平：《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8−39 页；郭梦圆：《清末〈储蓄银行则例〉研究》，海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等等。

⑩ 叶世昌：《信义银行的设立和倒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理和情理两个层面加以理解。就法理而言，《储蓄银行则例》第六条规定银行理事人对于储蓄存款应当负有无限责任，其偿还次序自然高于负有限责任的普通存款及其他债务。第七、八条规定了储蓄存款须单独计提准备金，且此准备金优先用于清偿储蓄存款。这两条也暗含了储蓄存款应当优先于普通存款及其他债务进行清偿。就情理而言，储蓄储户多为普通民众，“查储蓄银行所存之款，本皆贫民血汗之资”，① 而普通存款存户多为工商业者，条件相对优越。因此，这一清偿次序也符合偏向相对弱势群体的情理。

直至 1934 年《储蓄银行法》颁行前，《储蓄银行则例》都是民国前期储蓄银行设立、经营的主要依据。② 而信义储蓄银行倒闭案所形成的判例也影响着民国前期的司法实践。如在 1929 年中华懋业银行停业清理案中，国民政府所颁章程，体现了上述次序。③1931 年公布的《银行法》则在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了上述次序。④ 由信义储蓄银行倒闭案形成的判例，也就此进入成文法中。

综上所述，清末颁行的《储蓄银行则例》为近代储蓄银行发展确立了法律基础。清末发生的信义储蓄银行倒闭案所形成的判例，对于民国时期司法实践影响深远。

（三）兼营模式

日本近代储蓄银行多专营储蓄银行业务，并独立于一般商业银行。截至 1905 年（即信成银行成立前夕），日本共有储蓄银行 683 家，其中专业储蓄银行 481 家，商业银行兼营储蓄 202 家。⑤ 商业、储蓄银行业务兼办的金融机构在清末居于多数。大清银行设立的北京储蓄银行是独立的，但这只是个案。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的专业储蓄银行也并不多见。因此，清末中国与日本的储蓄银行在经营模式上存在差别。前者多采用兼营模式，后者则多采用专营模式。为何清末的储蓄银行未仿照当时日本更为主流的专营模式？

关于经营模式的选择，清末储蓄银行的倡办者有相当明确的解释。周廷弼在呈商部文中称：

> 闻其办法，大抵储蓄收入之款存之于普通银行，储蓄付出之款取之于普通银行。故普通银行实为储蓄银行挹注之源。日本系普通银行已经林立之国，储蓄与普通尚不皆分道扬镳，中国当普通银行尚未发达之秋，储蓄银行必与普通银行兼营并骛，运棹乃可逢源。⑥

张謇曾在南通倡办通州商业兼储蓄银行，未获成功。他在说帖中阐述了创办商业兼储蓄银行的缘由：

> 银行种类甚多，性质各别。其在民间者，大概以劝业为中心，以普通汇兑为手足，以储蓄为口鼻……顾储蓄而不与普通商业银行通，是但入而不出，壅久必胀绝，且无所资以付息。东西各国，各种银行皆具，自无此虑。中国民智尚塞，商学未兴，安得各种之银行同时并建？是今日为实业计，必先银行。为银行计，必先营储蓄而兼普通商业。以储蓄资普通商业之本，以普通商业资储蓄之息。⑦

在信成银行成立之前，资本明确可知的有中国通商、户部、浚川源、志成四家银行，合计

---

① 《江督札沪道文》，《新闻报》1909 年 7 月 10 日，第 18 版。

② 郭梦圆：《清末〈储蓄银行则例〉研究》，第 23 页。

③ 《财政部清理中华懋业银行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 年，第 565–566 页。

④ 《财政部关于转发〈银行法〉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第 572–580 页。

⑤ 協和銀行行史編集室編：《本邦貯蓄銀行史》，第 41–42 頁。

⑥ 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上册，第 43–44 页。

⑦ 张怡祖编：《张季子（謇）九录·实业录》卷 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97 辑，文海出版社，1983 年，第 1139–1141 页。该说帖应写于 1906 年。

4 591 333 元。[1] 截至 1879 年末（日本第一家储蓄银行成立前一年），日本有国立银行 151 家，有私立银行 10 家，总资本合计 44 446 100 日元。[2] 储蓄银行出现前，日本银行业基础相比中国更为雄厚。

既然日本的专业储蓄银行往往由商业银行出资设立，则相对发达的近代银行业是专业储蓄银行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如张謇所言，"东西各国，各种银行皆具，自无此虑。中国民智尚塞，商学未兴，安得各种之银行同时并建？"清末的北京储蓄银行得以作为专业储蓄银行出现，是因为大清银行拥有相对充足的资本。其他绅商所办储蓄银行缺乏类似条件，自然选择储蓄、商业银行兼办更为适宜。因此，相较日本，中国相对薄弱的近代银行业基础，是清末选择兼营模式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业务经营角度而言，商业银行无论在业务种类、存贷总额、利息收入等方面均胜于储蓄银行，商业、储蓄银行业务同时兼办，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以便支付储蓄存款利息。这便是周廷弼所言，"故普通银行实为储蓄银行挹注之源"，张謇所言"以储蓄资普通商业之本，以普通商业资储蓄之息"。

由天津银号所设博济储蓄银号虽有独立的字号，但实际经营方式可能也采用兼营模式。博济储蓄银号仅在天津银号内附设柜台，并无独立的经营场所，其员工也由天津银号员工兼任。[3]

（四）结合传统

信成银行的总行经理杨次梁原在钱业任事，具有传统金融业经验。[4] 据统计，四明银行创立之时来源于钱庄的资本至少在 45 000 两，约占 9%。四明银行第一任总经理陈薰原为源丰润银号经理，董事袁鎏原为上海北市钱业会馆董事，董事李翊燕开设有泰崇钱庄，董事吴传基开设有宁波源隆钱庄。[5] 如前所述，博济储蓄银号与天津银号在经营场所、工作人员等方面也均未分离。因此，传统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提供了资金与人才。

清末储蓄银行在集股过程中对于传统方法有所借鉴，并加以创新。中国传统经济中已发展出资本、收益按股分摊的股份合伙企业组织。由于每股金额一般较大，其中的股份又可按一定比率进行分拆，因此产生整股、零股（或称大股、小股）。这一传统集资方法也对晚清兴起的各类近代企业产生影响。一些近代企业在招股章程中也划分整股、零股。[6] 在清末储蓄银行之中，四明银行在招股启事中规定："资本规元一百五十万两，以一百万两为整股，分作一万股，每股规银一百两，以五十万两为零股，分作五万股，每股规银十两。"[7] 四明银行开办之时整股已收足半数，零股收足约三成。[8]

中国传统合伙企业组织对于资本有多种称谓，主要有正本、副本（护本）、附本（附股）、客本四种。正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伙资本，是一种股权；副本是一种股东存款，是一种债权；附本是投资者将一定数量合伙资本附于主要出资人股本之中，是一种股权；客本则是企业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方的借款，是一种债权。[9] 信成银行在集股过程中设立的积余股份同时借鉴了

---

① 通商、户部、浚川源银行资本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 501–502 页；志成银行资本见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754–756 页。

② 大隈重信等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第 11 册，商务印书馆，1929 年，第 60、73 页。

③《试办天津博济储蓄银号宗旨》，《北洋官报》第 1364 期，1907 年。

④ 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上册，第 58 页。

⑤ 宁波帮博物馆编：《四明银行史料研究》，第 10–11 页。该书记载袁鎏原为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应为北市钱业会馆董事。

⑥ 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第 17–34、373–378 页。

⑦《上海四明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招股启》，《申报》1908 年 4 月 1 日，第 1 版。

⑧ 宁波帮博物馆编：《四明银行史料研究》，第 8 页。

⑨ 张忠民：《前近代中国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副本"除可称"护本"外，有时也称"附本"，为免混淆，正文中不使用这一称呼。

上述副本、附本的集资方法，并融合储蓄方法加以创新。《信成银行积余股份章程》规定：“第一条，本银行为广设分行、扩张营业起见，特于原集正本银五十万圆外，添集股水银五十万圆，以为准备。第二条，此项添集之股份以利益普及为主义。特本储蓄之意为募集之法，务使轻而易举，人人皆可节日用之需，作附股之资。”该章程将招股章程中募集的五十万元股本称作“正本”，而将积余股份称为“附股之资”。换言之，一般募集的股份即为正本，而积余股份也就相当于传统的副本、附本。积余股份与正本每股金额均为五十元，因此二者之间也并非前述整股、零股的关系。

积余股份的缴股方法分为乾字、元字、亨字、利字、贞字五种。其中乾字、元字、亨字缴股办法类似零存趸付储蓄存款，利字、贞字缴股办法类似趸存趸付储蓄存款。如乾字缴股办法，每月缴银 1 元，44 个月期满发给积余股份 1 股（即相当于 50 元），其中 6 元差额即为利息。积余股份与正本一样享有官利七厘。在进行利润分配时，正本股东可得盈利八成，积余股东可得盈利二成。[①] 积余股份缴纳过程中含有一定利息，此种利息又有别于近代企业中的官利，[②] 因此体现的是积余股东对于企业的债权，类似于副本。积余股东与正本股东一样可以参与企业的盈余分配，体现的是积余股东对于企业的股权，类似于附本。而积余股东缴纳股款的方法又类似于储蓄存款，因此又融合储蓄方法加以创新。因资料缺乏，信成银行积余股份具体募集情况不得而知。

无论是四明银行划分整股、零股进行集资，抑或信成银行的积余股份办法，其产生原因都是原有整股金额过大，拆分零股或分期缴纳的办法可使投资者更易购买股份。[③] 这反映了清末储蓄银行面临募集资本的困难。

回顾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特征，清末的中国与日本类似，经济发展水平较西方相对落后，故仿日本以营利组织的形态开办储蓄银行。但清末中国相比日本，银行业基础更为薄弱，所以采用日本并非主流的商业、储蓄银行兼办的模式经营储蓄银行。由清末信义储蓄银行倒闭案确立的债务清偿顺序，也对民国时期的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传统金融机构为储蓄银行的兴起提供了资金、人才的支持。储蓄银行在借鉴传统集股方法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创办初期资本不足的窘境。

四、余论

晚清银行史的书写主要有“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以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为例，在“革命史”范式下，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为“杜洋商之挟持”，即意在打破外国资本对于晚清金融市场的控制。在这一范式之下，外商银行的经济侵略是中国银行业诞生的历史条件之一，晚清银行业是“欧风美雨”侵袭下结出的“苦果”。[④] 在“现代化”范式下，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主要为满足晚清财政借款与工业化的需求。在这一范式下，反对经济侵略的动因则位居工业化需求之下。[⑤]

---

① 《信成银行积余股份章程》，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上册，第 49–50 页。

② 关于近代企业的官利制度，参见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③ 前述积余股份中的利字、贞字缴股办法不属于分期缴纳股本，而是通过趸存趸取的办法，以固定利息激励民众购买积余股份。

④ 汪敬虞：《略论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及其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这一范式下的研究另可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1897 至 191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5 页。

⑤ 程麟荪：《近代中国的银行业》，第 21–26 页。这一范式下的研究另可参见陈礼茂：《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与早期运作研究（1896—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3–64 页。

为何笔者认为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无法为上述两种范式所涵盖呢？上述两种范式虽然均认为中国通商银行此后的经营，在“杜洋商之挟持”的目的上实现程度不高，[①] 但是创办目的与实践效果本为两事。首先，盛宣怀对于兴办银行、挽回利权，有非常清晰的表述。[②] 其次，中国通商银行开办过程中外商银行的阻挠，也表明确实触动了外商银行的利益。[③] 因此，晚清华资商业银行的产生是对于外商银行经济侵略的一种“回应”。但是，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很难认为是对于西方“冲击”的“回应”。如前所述，1881 年汇丰银行在上海开办储蓄业务。笔者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很难确切地估计汇丰银行这一举动所收到的效果，但从周廷弼所阐述创办缘由来看，并无任何试图与汇丰银行储蓄业务进行“模仿性对抗”的表述，而是格外强调满足中下层民众的金融需求。[④] 此外，周廷弼也清楚地说明，他所办的信成银行主动参照了日本储蓄银行，与汇丰银行并无关联。因而，汇丰银行在 1881 年所开办的储蓄业务，并不构成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实践基础。综上，在储蓄银行兴起这一现象之中，内、外因呈现这样一种关系：清末的倡办者主要为满足近代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金融需求，而选择性地利用国外已有的金融组织形式。相比商业银行的产生，储蓄银行的兴起显示出清末中国内部更强的能动性。

上述范式下的“近代”银行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股份制商业银行。即使一些研究强调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结合了部分传统因素，[⑤] 但也只是在单向度过程中的某种折中。在上述范式下，中国银行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过程，仍然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是一个“单一的连续体”。[⑥] 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实践逻辑与上述范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作为“近代”的储蓄银行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作为参照的西方储蓄银行即具有内部差异，储蓄银行在英国是一种慈善组织，传播到美国却广泛产生了营利性质的储蓄银行。作为中国学习对象的日本储蓄银行又为营利性质，不同于西方的非营利性储蓄银行。清末储蓄银行倡办者向日本学习时，也未照搬日本的主流经营模式，而是根据本土情况采用了兼营模式。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知清末储蓄银行兴起的实践逻辑呢？社会学家罗兰 · 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实践逻辑。这一概念将“全球化”与“本土化”合为一词，指“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⑦] 从全球范围而言，储蓄银行在各国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源于近代化过程中民众日益强烈的金融需求。虽然中、日两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关于储蓄银行对工商业、财政的意义多有强调，但一般商业银行也能部分满足这两项需求。因此，这两项需求并非储蓄银行产生的根本原因。各国储蓄银行因为本土经济、金融环境的差异，又展现出不同的实践形态。

就中国而言，清末倡办者主动引入储蓄银行因应内部需求，对于西方非营利性储蓄银行的慈善性质也并非一无所知，也希望可以仿照日本建立独立的储蓄银行。但本土经济、金融环境的限制使得他们不得不建立营利性储蓄银行，也大多只能办成兼营模式。同时，传统因素对于储蓄银行的兴办也具有促进作用。传统金融业为储蓄银行的创办提供了资金、人才的支持，储蓄银行在招股困难的情况下则借鉴了传统集股方法，并加以创新。另一方面，新政期间新的时

---

① 汪敬虞：《略论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及其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程麟荪：《近代中国的银行业》，第 31 页。

② 《盛宣怀奏呈自强大计折附片（节录）》，陈旭麓等主编、谢俊美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6 卷《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4 页。

③ 陈礼茂：《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与早期运作研究（1896—1911）》，第 47–49 页。

④ 《创设储蓄银行禀批汇录》，《津报》1905 年 10 月 16 日，第 6 版。

⑤ 陈礼茂：《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与早期运作研究（1896—1911）》，第 83–86 页。

⑥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04、206 页。

⑦ “Glocalization ”又可译作“全球地方化”或“全球在地化”，罗兰 · 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文版序言”，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 页。

代氛围、经济机构、经济法规、官商关系等现代因素，也有利于储蓄银行的兴起。

因此，清末储蓄银行的兴起所展现的外因与内因、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全球与本土相交融的实践逻辑，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金融近代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路径。

References

Cheng Linsun, *Jindai Zhongguo de yinhangye* (Banking in modern China: 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 1897−1937), Beijing:Shehuikexuewenxian chubanshe, 2021.

Wang Zhishen, *Zhongguo zhi chuxu yinhangshi*(A history of Chinese savings banks), Beijing: Zhishi chanquan chubanshe, 2015.

The Reasons,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se of Savings Ban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U Sizhe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klspsz@163.com)

Abstract: Savings banks are a type of bank that specialize in collecting sporadic deposits from the public. Originating in England and spreading globally, the savings bank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rough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avings banks quickly emerged in various reg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e to their advantages of facilitating the public saving,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ng for fiscal deficit. The main initiators of savings ban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centr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local governors, and local gentry-merchants. The rise of savings banks had four characteristics—for-profit organization, timely legislation, parallel operation models, and integration with tradition. The Qing goverment also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savings banks because of the new era atmosphere, economic institutions, economic regulations,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and other modern factors during the New Policies period. It helps to re-examine China’s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by the practical logic of “Glocalization” reflected in the rise of savings ban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avings Bank,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Glocalization, New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avings deposits